



越洋再建家园

洋国界
海中与世

——新加坡华人社群文化追踪

12 總計 40,000,000

越洋再建家园

——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

■■■■ /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杨国桢 主编

海洋
中国
与世界
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洋再建家园: 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 / 曾玲著. —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3.8
(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 / 杨国桢主编)
ISBN 7-81075-473-4

I. 越... II. 曾... III. 华侨状况 - 研究 - 新加坡
IV. D634.33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69834号

海洋
中国
与世界

越洋再建家园

——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

曾玲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

邮编: 330046 电话: (0791) 8592235 8504319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恒达科贸有限公司照排部照排

封面印刷: 江西新华印刷厂

内文印刷: 江西教育印刷厂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850mm×1168mm 1/32 11.375印张 200千字

印数: 1-2500册

定价: 29.50元

ISBN 7-81075-473-4 D·027

(江西高校版图书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20 世纪后期,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大幅提高,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又给人类的生存带来潜伏的危机。随着陆地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未来文明的出路在于海洋,已成为国际共识。21 世纪的海洋开发与竞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焦点之一。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又是一个海洋大国,西部大开发与东出海洋是实现经济腾飞、民族复兴的两翼,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走入海洋,走向世界,是历史的大趋势。中国能否抓住发展机遇,建成海洋强国,与海洋世界产生良性的互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能否经受西方海洋霸权的挑战,消解遏制与对抗,在海洋竞争中占有自己的生存之地,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这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的研

究,是21世纪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课题。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对历史的学术兴趣从陆地转移到海洋,对海洋发展陆地化描述的历史文本产生了怀疑,开始酝酿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人文社会学的探索。由于自知这是一项艰难的研究计划,需要聚集力量,长期冷静思考,不断探索,不能为浮躁之风所动,以时髦理论虚构历史,或急于求成,追求轰动效应,故设想结合博士生的培养来进行研究,指导他们各选择一个专题,用3~4年时间,一步一个脚印、一届又一届地做下去。我的设想和思路得到博士生们的响应和认同,师生几经切磋,于是有一批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虽有几个失败无成,但大多间有新见,为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做了基础性的学术积累。

1996年,江西高校出版社独具慧眼,支持我挑选一些博士学位论文加以修改,编成丛书,申请列入国家重点图书规划,并主动承担出版任务。在他们的热心支持和鼎力帮助下,《海洋与中国丛书》(8册)在上个世纪末面世,并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鞭策和鼓舞,促使我下定决心与时俱进,拓展研究计划,争取2010年前在主要领域都有开拓性、创新性的成果,夯实中国海洋史学的基础。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套丛书(12册),便是《海洋与中国丛书》的延续,又是厦门大学“211工程”第二期建设项目的成果之一。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以海洋中国与海洋世界的互动为研究平台,进一步深化中

国海洋历史文化的研究;破除忽视海洋发展的观念、心态和认识的盲点,用翔实的历史人文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论证海洋是沟通中外的大通道,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空间,海洋对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和安全具有重大的国家利益,海洋国土是历代先人开拓经营的结果,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海洋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突破国家、民族的界限和传统的学科结构,实现多学科理论、方法的渗透和融合,推动海洋史学的学科建设和博士生培养;分析中国海洋发展与海洋世界互动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现实和未来的实践提供借鉴。

纳入本丛书各书,是从博士学位论文和国家、教育部社科学研究规划及国外合作项目成果中选取的。作者大多风华正茂,都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善于吸收国内外学界的新成果、新经验,有的已有多年积累,又经多年潜心研究,虽然水平难求一致,但均有创新的亮点。本丛书的内容分别涉及中国历史上的海疆政策、海洋经济管理、海神信仰、海上走私与反走私、海洋灾害、东南海洋区域、海上山东、环黄渤海经济圈的生态环境、经济开发与社会文化变迁、环中国海沉船、南海纷争与海洋权益、西洋航路移民、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的研究,多属立足学术前沿,扣紧时代脉搏的问题。在指导思想、研究主题、研究概念、研究方法、研究顺序上,实现从陆地本位向海洋本位的转换,把海洋视为一种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的进程,而不仅是单纯的区域概念或产业概念;站在

历史学的立场,整合海洋考古、宗教史、环境史、灾害史、科技史、海洋经济地理、海洋法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和成果,填补研究空白,为海洋史学整体框架添砖加瓦,体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特色和风格,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勇于面对时代需要,追求传统与变革连续性的新思路,发挥学术的社会功用,有较强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了增强学术著作的可读性和扩大读者群,作者在通过论文答辩或课题成果评审之后,又对标题和文字作了大量的加工,或作章节调整,重新改写。所有引文都经查核原书,反复校对,力求准确无误。

我们深知,上述内容在中国海洋历史文化领域还仅是沧海一粟,要完成最初的构想还任重而道远。一代有一代的学术,让非主流的海洋史学登上中国的学术殿堂,是我的梦想。感谢厦门大学的研究经费资助和江西高校出版社的精诚合作支持,给我圆梦的机会。人文社会科学对研究对象的阐述和说明不会有终极的结论,只要学术界承认我们努力过,尽心了,就是最高的褒赏。至于是否能够二十年磨一剑,形成具有独特风格、气派和特色的中国海洋史学,还要看今后的努力和学术的检验。

由于海洋发展在国史上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造成资料信息的大量流失和断层,今人所能见到的只是一些断面或碎片。即便如此,从民间和海外发掘史源,还有很大的难度。由于资料分散,检索不易,不少还需实地调查才能获得,受到人力、时间和资金的制约,埋藏地下和海底的文物证据更有待考古的新

发现,加上文理、古今、中外之间,学科专业分工过细,往往有好的选题,却一时难竟全功。特别是外国档案文献的利用,缺乏通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阿拉伯等语言的学术专才,需要培养引进方能解决,有关从海洋世界看中国的许多课题只好延后处理。此乃时势使然,非“不战”之罪,敬请读者见谅。

历史事实是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出发点,海洋史学的成熟有助于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发达。这是可以期待的。我们希望以书为媒,广交关注海洋的学术与职业背景不同的有识之士,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共同为提高海洋意识,弘扬中国海洋文化,繁荣海洋事业而努力。作为新兴学科,有许多新的发展空间,需要许多新人的参与、继承、开拓和超越。相信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海洋史学将在中国大放光彩。

楊國植

2003 年元旦

致读者

以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历史与文化为考察对象的研究，在国外已有相当的积累，在中国学界则基本是空白。新加坡社会与华人研究涉及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多个学科，关注的领域包括新加坡华人历史与变迁、华人身份与认同问题、华人的家庭婚姻与宗教习俗，以及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等课题。在研究取向上有两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其一为新加坡视野，其二是将新加坡华人作为中国研究实验室。而以“海洋中国与世界互动”理论框架研究包括新加坡在内的海外华人社会，是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一个全新视野。

“海洋中国与世界互动”是笔者的导师杨国楨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思考和建构的一个研究新领域。杨教授认为，中国是一个兼具陆海、生态环境多样性的大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向海洋进军，发展了自己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类型，积淀了丰厚的海洋文化，体现了中华文明海洋性的一面。为此，必须在既有的与海洋研究有关的分支基础上进行概念磨合和学科整合，以拓展中国的海洋人文学类型研究¹。在杨教授提出的整合内容中，就包括了中西交通史、华侨华人史等学科。以海洋中国的视野研究海外华人社会，明清华南的海外移民是这一区域海

洋经济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中国史研究的视野只是局限于中国而不顾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必然随着史学的现代化而被抛弃。当我们随着海外移民的双向流动去体验它的历史内涵时，不由地感受到中国人文血脉的另一处跳动，人们没有理由让它永远沉寂”²。当华人在二战后的独立国家中，虽然在国家认同上已经转变侨民身份成为所在国公民，但源自华南社会并在移居地自然与人文脉络下调适与发展起来的华人文化，既具有当地社会的本土特征，亦是中华民族海外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即是在上述杨国桢教授倡导的海洋人文的架构下，以新加坡华人社会为考察个案的一个尝试。

1987~1991年笔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在杨师国桢教授的指导下，以福建手工业经济发展史为题撰写博士论文。那是笔者较有系统地接触华南地域特征和中国海外移民状况的一次研究尝试。与中国其它内陆省份相比，包括福建在内的华南地区“依山傍海”，历史上就具有农业与海洋并存的经济结构，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与文化形态。明清以来，由于中国和东南亚社会经济的变迁，华南地区的海洋性特征不断发展，其表现主要有华南百姓“以海为田”，从事高风险的私人海上贸易；大量破产农民和城市平民南下东南亚拓荒，近代鸦片战争以后更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海外移民潮等。因此，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对华南区域地方性的海洋文化传统和以民间穷苦百姓为主体的华南海外移民构成特征的了解，为我以后考察源自华南祖籍地的新加坡华人社

会打下基础。

1994年至2001年，笔者随家人移居新加坡。2001年4月回国后，我又多次往返新加坡参加学术研讨会或访问研究。在新加坡的七、八年里，我于教学工作的同时，有幸承担了多项研究计划。这些计划包括新加坡历史博物馆的《华人村落潘家村的调查研究》、《华商俱乐部怡和轩一百周年研究》；新加坡华裔馆的《当代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研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的《华人民间文化研究——以中元节为个案》、《二战后三十年华人宗乡社团变迁》。另外，笔者还实际主持了《从宗乡组织看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本土化：以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的金石、档案资料为切入点》计划。这些计划涉及新加坡华人社会与文化的多个研究领域，在实施过程中，闽粤民间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承与变异始终都是探究的核心，考察它在建构新加坡华人社会与文化中的意义，以及这一文化形态在新加坡脉络下的演变，进而思考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海外华人文化的内容与形态等问题。

本书共分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从1819年开埠迄今的近二百年来，在近代以来中国和新加坡、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社会发展脉络下，华人社会伴随新加坡从殖民地时代到本土社会发展而经历的历史变迁过程。

第二部分是对外人社会结构的考察。自新加坡开埠，殖民地政府实施半自治的社会政策，为了维持华人社会的内部运作，华人移民运用传承自祖籍地

的文化资源，建立了包括会馆、宗亲会、行业公会等在内的各类社团。本书以个案研究方式，考察了以往的研究较少涉及的新加坡华人宗族社会、帮群坟山、华商社团等三种重要的组织形态。这三类社团有着各自的认同形态和组织原则。“潘家村”是透过祖籍地血缘纽带连接而建立的宗族社会；坟山组织在“帮群”的架构下设立，体现的是比单一的祖籍地缘、姓氏血缘、业缘等社团更具整合空间的“帮群”认同；怡和轩俱乐部则在其创立之初，就是一个跨“帮”的华商社团。这三类建立于殖民地时代移民社会早期的华人社团，在新加坡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伴随当地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而演化。这些社团组织的建立与发展虽各有其特色和轨迹，但都是新加坡华人重建其社会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加坡华人民间文化的基本形态是由华南移民自祖籍地传承而来。受华人移民构成的制约，源自祖籍地而又在新加坡近两个世纪历史演化中逐渐发展出本土特色的民间文化，不仅是建构新加坡华人社
会的基本资源，也是今天新加坡华人文化重要和基
本的组成部分。本书的第三部分讨论新加坡华人民间文化中的祖先崇拜、民间信仰、节日习俗等三种形态。笔者以宏观考察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具体讨论新加坡华人祖先崇拜中的社群先人和血缘家族（家庭）先人两类崇拜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在祖先崇拜场所、方式、功能等方面的变化与特征；考察神明信仰与龙牌崇拜对华人宗乡社群的整合与转型、华人人际关系网络的意义；研究新加坡华人节日

习俗的社群特征、节日习俗对于维系与加强华人的中华文化与种族社群认同的价值与功能。

本书的第四部分考察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的跨国活动。在全球经济呈现一体化的当代世界,海外华人宗乡社团的跨国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跨国网络,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这一部分,笔者从海外华人尤其是认同中华文化的传统华人社团的“宗乡文化”和“本土认同”双重认同形态入手,讨论海外华人宗乡社团跨国网络的建立、特征及其功能等问题。

最后,本书总结全书各章的考察,并从新加坡的个案研究,进一步讨论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海外华人文化的内容与特征等问题。

本书基本的历史脉络是19世纪20年代新加坡开埠以来东南亚、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演化。本书将此线索作为研究的“经”,视所讨论的具体问题为“纬”。在“经”的历史变迁中,对新加坡华人建构的社会与文化诸问题做动态的考察。除了历史关怀,本书在具体个案讨论中,也试图融入历史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研究等一些相关概念和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跨科际的沟通与整合。

新加坡殖民地政府档案、金石碑铭、会议记录、社团特刊、报刊等原始记载,是本书的基本资料。本书个案研究的资料主要来自田野调查。本书的田野调查材料,主要是从1994年10月笔者进入新加坡历史博物馆开始,到2001年4月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回返厦门大学止。在这长达7

年的时间里，笔者主要的田野工作是新加坡福建社群所属社团、碧山亭坟山组织和广惠肇三属宗乡社群，并以此为切入点了解和研究整个新加坡华人社会。此外，因相关课题研究所需，笔者几乎走遍了20世纪70~80年代重建、具有新加坡殖民地时代帮群色彩的华人坟山，位于新加坡牛车水、芽笼、武吉巴梭、直落亚逸、义顺等地的华人会馆、宗亲会、行业公会、俱乐部等各类社团，以及许多华人传统庙宇、重建的联合庙(宫)和一些讲英文华人社群较多前往的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等，参与、观察并记录这些社团的各类会议和新春团拜、采青、周年庆典、中秋迎月等节日庆典，以及新加坡华人的中元普渡、神明诞辰等宗教活动与祭祀仪式等等，通过调查访问、深入访谈社团领袖和各阶层、各年龄段的华人，获得第一手资料，以期尽量准确把握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

本书整合笔者在新加坡所做田野报告和个案研究的成果，结合相关的档案、报刊和其它文献，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但由于时间和能力有限，还有许多内容未能开拓或深入，有待今后的继续努力。

本书在写作和出版中，杨国桢教授不仅在理论架构上给我许多启发，还在繁忙的行政和科研工作中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谨致最深的谢意！

当我从中国明清史转入新加坡华人研究新领域过程中，多位前辈、同行、同事和朋友从不同的学科领域给了我支持与帮助。我首先要感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和中心主任周清海教

授、新加坡历史博物馆和前馆长林孝胜先生,以及新加坡华裔馆和前馆长纪宝坤教授等三个研究机构及负责人。是他们给笔者提供了研究机会与经费。以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海外华人社会,使我获益最多的是李亦园教授和庄英章教授。李教授是我十分景仰的文化人类学家。在我移居新加坡后,李教授即鼓励我利用身处新加坡之便,展开东南亚华人研究。他又多次惠赠大作和支持我提交的研究计划。庄英章教授多年来一直支持与帮助我进行学术研究。在我从1997至2001年受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期间,庄教授对碧山亭计划从研究方法等方面给我许多指导与帮助,并鼓励我对源自同一祖籍地的新加坡华人社会与台湾汉人社会进行比较研究。对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历史学研究,我有幸得到滨下武志教授、王庚武教授、颜清湟教授的鼓励和赐教。吴振强教授、林孝胜先生、李元瑾教授等更给我许多直接的支持和帮助。

在新加坡华人研究和田野调查中,我特别要提及郭振羽教授对我的教诲与帮助。郭教授是一位在多个领域颇有建树的社会学家。郭教授多元的研究方法和他对我多个研究计划的具体指导,拓展了我的学术胸怀和研究视野。

本书的研究,我还获得许多前辈、同行和朋友在不同方面给我的帮助,我对周南京、梁志明、崔贵强、吴华、刘宏、李明欢、廖赤阳、李威宜、蔡志祥、陈春声、郑振满等在各地的朋友深为感谢。

我的家人是我完成艰苦学术研究的重要支柱。

上小学的女儿，经常在周末陪伴我奔走于新加坡的坟山和会馆，与我分享田野调查的苦与乐。外子林旌扬虽有自己繁重的工作和研究领域，但他仍以爱和关怀鼓励支持我面对新领域的挑战。他不仅分担我在研究中的烦恼，还以自然哲学的思维提供我不少新视角，本书中许多重要观点，就是在与他的讨论甚至是争辩中形成的。

在新加坡和东南亚多年的工作与生活，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我深深感激许许多多华人前辈、华社领袖、社团领导和数不清的新加坡华人。我从他们对新加坡华人奋斗历史的讲述和所提供的各类帮助中，不仅获得许多重要的、第一手的原始研究资料，帮助了我的学术发展和进步，更重要的是，这些历史和故事中所体现的、由华南移民在海外华人社会发展起来的坚忍不拔与奉献社会的人文价值观，深深激励我的学术和人生道路。我谨以感恩的心情，将此书献给在新加坡披荆斩棘、艰苦耕耘，为中华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开花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新加坡华人。